

关于抗战初、中期冀中解放区的历史概况

——兼与王海印同志商榷

肖 一平

《炎黄春秋》杂志 2006 年第 7 期发表的王海印同志撰写的《白求恩助手辛育龄采访记》一文,是一篇好文章,它生动地论述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率领下的医疗队,在烽火纷飞的冀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抢救八路军伤员的英雄事迹及其亲密助手辛育龄教授在白求恩大夫培养下的成长过程。读后感人至深。

我自 1937 年至 1943 年一直在冀中地区工作,全国解放后多年研究抗战史,因此对冀中地区的抗日战争情况有所了解。在阅读上文(以下简称王文)过程中,发现有多处重要史实不准确,现作些说明,供作参考。

一、王文第 1 页正 12 行有这样一段话:七七事变发生后,“由政委程子华、政治部主任孙志远领导的抗日革命组织——冀中抗日民族自卫军……半年之后,贺龙同志率领的部队到达保定,将自卫军改编为八路军,成立了冀中军区”。

历史的真实情况是:

(一)冀中平原是华北晋察冀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冀中抗日根据地初创之时,共产党组建的抗日武装,主要有四大部分:即“人民自卫军”、“河北游击军”、“抗日义勇军七、八支队”和“华北民众自卫军”;那时候并没有“冀中抗日民族自卫军”这一番号。这是一。其二、1937 年秋冬之交,沿平汉铁路向南进攻

的日军,已于9月24日占领保定,10月10日占领石家庄;沿津浦铁路向南进攻的日军,于9月24日占领沧州,10月5日占领德州。那时,冀中地区共产党挺身而出,号召各阶层人民武装起来,保家卫国,组建了多股小型抗日武装,其中主要是由中共保属省委直接掌握的抗日武装——“河北游击军”和由各县共产党掌握的——“人民抗日自卫团”。此时,冀中地区党、军主要领导人是:张君、孟庆山(中共中央派来冀中的老红军干部)、侯玉田、吴健民等人。那时,程子华和孙志远都不在冀中地区(程在山西,孙在冀西)。

(二)1937年9月侵华日军占领保定不久,日军一个师团司令部常驻此地,伪河北省政府也设立在这里。1939年(即“半年之后”),贺龙及其率领的部队根本不可能到达这里。所谓在保定“将自卫军改编为八路军,成立了冀中军区”,则是“子虚乌有”。冀中军区是1938年初在河北省安平县宣告成立的。

(三)1937年七七抗战发生后,吕正操(中共秘密党员)奉中共中央北方局之命,率领原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千余官兵,于1937年10月14日,在河北省晋县小樵镇宣布甩掉国民党军番号,改称“人民自卫军”,回师冀中平原,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同年11月间,孙志远奉聂荣臻(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兼晋察冀军区司令员与政治委员,代表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全权领导晋察冀边区的党、政、军工作)之命到达冀中,担任“人民自卫军”政治部主任之职。

(四)1938年1月,成立中共冀中省委,鲁责任省委书记。同年5月1日,成立冀中政治主任公署(后改称“冀中行政主任公署”,简称“冀中行署”),李耕涛任主任。同年8月下旬,中共冀中省委改称中共冀中区委员会(简称“冀中区党委”),黄敬任书记。此时,共产党领导下冀中人民抗日武装已“号称10万”,先后从日

伪手中收复县城 20 余座, 辖区 40 多个县, 人口 800 余万。5 月 4 日, 冀中抗日根据地两支主力部队——吕正操率领的“人民自卫军”与孟庆山率领的“河北游击军”, 奉中共中央之命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 同时成立冀中军区, 由吕正操任司令员, 孟庆山任副司令员, 王平任政治委员(1938年9月赴任)。1939年1月8日, 程子华奉中共中央之命, 从延安经晋察冀军区来到冀中就任八路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

(五) 1938年至1942年这段时间, 冀中解放区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如下: 区党委书记黄敬, 副书记鲁贲(1940年牺牲), 组织部长刘亚球(原部长张君1939年赴延安学习), 宣传部长周小舟、军事部长黄兴义, 社会部长最初是侯玉田, 后是李衡、张国坚, 行署主任吕正操(兼), 副主任李耕涛(1940年以前)、副主任徐达本(1940年至1942年)。军区司令员吕正操, 政治委员王平(1939年以前)、程子华(1939—1944年), 副司令员孟庆山(1940年4、5月间离职赴延安学习)

二、王文第1页倒3行, 有这样一段话: “齐会是河间府的一个小山村, 是日寇的一个重要据点, 我一二〇师到达以后, 首先把战斗的重点放在这里。战斗打响以后, 敌人凭借着精良的装备很嚣张, 叫嚣着向我军攻来……”

历史真相是:

(一) 齐会并不是一个“小山村”, 而是一望无际的冀中平原河间县的一个有 400 多户人家的大村庄。当时, 齐会村处于我抗日根据地中心地带, 多年在我手中, 并非“日寇的一个重要据点”。齐会战斗是 1939 年 4 月下旬(23 日至 25 日)打的, 由贺龙将军亲自指挥, 以一二〇师主力部队为主, 冀中地方部队配合, 共 8 个团, 在广大人民支援下, 激战 3 昼夜, 全歼日军精锐部队第二十七师团第三联队吉田大队官兵 700 余人(只有 10 人逃往河间县城), 并缴获

其全部武器、辎重。此役，首创抗日时期“平原游击战大量歼敌的模范战例”。

(二)贺龙将军、关向应政委亲率八路军一二〇师主力部队到达冀中地区的时间，是1939年1月25日。当时，华北日军正集中数万大军分区、轮番疯狂围攻冀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近3个月中，全部县城被敌占领，形势十分危急。一二〇师到达后，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狠杀了日军威风，稳定了冀中战局。从1939年5月至10月，我利用青纱帐有利季节，大刀阔斧地全面进行建党、建政、建军、发动群众、扩大巩固抗日统一战线和加强对敌斗争，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开始进入健康、巩固发展时期。1939年8月，一二〇师主力部队奉命撤离冀中。

三、王文第3页右侧倒17行说：“1942年，根据中央部署，一大批知识分子调往延安学习，他（即辛育龄）被派往延安。”

在时间与事实上，均欠准确：

(一)当时中共中央的部署，不只是抽调“一大批知识分子”，而主要是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抽调一大批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群领导干部到延安学习、培训（其中有一部分同志是知识分子出身）。那时，从敌后调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各级领导干部近万名，大部分是工农出身。

(二)从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调大批领导干部到延安学习的时间，并不是1942年，而应是1943年和1944年（路上行军，一般需一两个月或几个月，有的还需一年左右时间，如华南）。

(三)当时的具体情况，大体如下：1941年和1942年，是敌后抗战最困难的岁月。在此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全力准备和发动太平洋战争，便急于“征服中国”，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则是其致命障碍。为此，侵华日军即决定集中其大部主

力部队轮番地进攻、“扫荡”华北、华中解放区，妄图一举消灭之；尤以华北地区为其作战重点。仅在1942年，侵华日军就在华北战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两次大“扫荡”：一是从5月1日开始，日军集中5万余兵力，对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进行整整两个月毁灭性的“大扫荡”（史称“五一大扫荡”），我军队、地方干部和部队损失惨重，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大部沦为敌占区，一部沦为游击区；二是5月中旬至6月下旬，日军集中3万余精锐部队，以突袭八路军总指挥部为目标，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38天的“大扫荡”，我党政军干部和部队伤亡甚大，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指挥作战中壮烈殉国。这两次战役，我根据地各阶层群众被日寇惨杀和抓走近10万人。面对如此险恶形势，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在敌后解放区进一步贯彻精兵简政政策，并作出两项重大战略决策：一是大大缩减敌后战场的主力部队，加强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建设，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二是保存干部，从华北、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抽调大批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群领导干部来延安学习、培训。1943年1月1日，中共中央曾作出《关于征调敌后大批干部来陕甘宁区保留、培养的决定》。由于1942年八路军总部遭袭和左权将军牺牲，党中央和毛主席曾于1943年多次商谈把八路军总部从太行山迁移至环境比较安全的晋西北地区。1943年和1944年，冀中地区先后调往延安的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有近千人，仅1943年春季，就有600名左右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调往延安（本人也是其中之一员）。估计辛育龄教授就是1943年离开冀中（或是冀西）调往延安的。

（四）1942年“五一反扫荡战”结束后，冀中平原解放区沦为敌占区和游击区，我军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暂时转移至冀西山区。1943年初，根据党中央指示，冀中区主要领导人作了如下调整：由军区政委程子华兼任区党委书记（黄敬调任冀鲁

豫区党委书记),马辉之任副书记(原平西区党委书记),张国坚任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周小舟仍任宣传部长。吴砚农任冀中行署副主任。1943年8月,党中央根据当前敌后斗争的严重形势作出如下决定:1. 撤销冀中区党委、冀中行署、冀中军区;今后冀中各地委、专员公署、军分区,由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和晋察冀军区直接领导;2. 吕正操调任晋绥军区司令员,程子华调任晋察冀分局副书记兼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3. 冀中区党委撤销后,晋察冀分局设立冀中工作委员会,马辉之为主任,周小舟、张国坚为委员,协助晋察冀分局处理冀中区的日常工作。

上述历史情况,在近些年我国出版的《贺龙传》、《吕正操回忆录》、《程子华回忆录》、《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抗日战争史》、《冀中抗日根据地斗争史》、《一二〇师战斗在冀中》以及《白求恩传》等著作中,均有具体记载,可作参考。

(作者肖一平,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荣维木)